发展策论

数字化改革是深化我国改革开放，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浙江作为我国数字化改革的先行省，已在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法治以及基层治理等领域取得了诸多卓有成效的成果。比如，在全省构建了一体化数字资源系统，打通了“数字孤岛”，实现了数字资源的高效共享利用；探索性地构建了一大批便民利民的数字化场景利用平台，“浙江公平在线”“浙里办”以及浙江质量在线等已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但随着数字化改革的深入，对数字化改革认识不足的现象也日渐显现……比如，简单地将数字化改革理解为数据上报、数据共享平台建设以及数字技术场景利用的模糊认识，甚至还存在部分数字化改革无用论等偏离数字化改革逻辑的错误认识。因此，有必要深刻理解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机理，以期增强推动数字化改革的思想自觉。

打造数字化改革“硬核”成果（来源：浙江新闻）

深刻理解 数字化改革的逻辑机理

伍湘陵

A 数据成为生产要素是数字化改革的核心因素

进入数字化社会，大数据时代中的每位个体无时无刻不在生成数据、传递数据、处理数据、应用数据，同时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也无不依赖数据的集成与利用，数据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要素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但这一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又存在诸多区别，其中之一便是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物要素，其价值体现主要在于数据本身的场景融入，也就是数据从产生到处理再到利用的全过程化价值体现。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带来的挑战不仅与传统要素配置的市场基础不同，同时价值体现也存在区别。

根据马克思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始终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始终。数字技术促进了数据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由此对原有生产关系也带来调整。那么科学认识数据要素带来的生产关系变化，并对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进行改革，就必须遵循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自觉地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使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和发展。当前数字化改革便是基于数据要素对生产组织关系、市场交换方式、分配方式以及消费方式等带来的变革，科学促进社会生产力不断提升而采取的必然措施。

B 数字化改革是社会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手段

随着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发展与广泛运用，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社会各领域和全过程。我们已经进入数字化社会，由数字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方式改变、社会治理结构的重塑、改革开放格局的调整等都要求改革束缚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壁垒、组织壁垒、要素壁垒以及市场壁垒。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革，同时对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也带来重大影响。

在数字技术及其多场景融入的发展趋势下，数字化改革已成为社会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手段。通过数字化改革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实现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一方面在于通过打破数字利用壁垒，弥合“数字鸿沟”，实现数字技术发展红利共享。另一方面在于规范与充分利用好数字技术，高效实现全民、全时及全域精准治理。在依靠数字技术发展的同时，有效推进数字化改革，创新社会治理手段，加快了社会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

C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数字化改革的价值起点

智慧教育、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政务等主要依靠数字技术发展而出现的各类数字化场景，已在生活中无处不见。“数”融百业，“智”兴万物，数字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各场景融入，正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体现与实现方式。数字技术优化与美化了我们的生活与工作环境，不仅让我们体验了高效与便利，同时让我们有更多机会从线下走向线上，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活动空间。而数字化改革则是破除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影响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种种壁垒，这是数字化改革的价值起点。

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融入广度与深度的提升，使得数字化改革不再是一个“选择题”，而是“必答题”。科学理解数字化改革，不能简单秉持实用主义，仅停留在数字技术发展与赋能的器物层面，更应关注的是数字赋能带来的思维、理念及制度变革。数字技术带来的变革是有迹可循的。

其一是作为社会主体的我们，活动空间已发生极大变化，线下与线上的高频度切换，社会思维与制度空间边界也同步扩大。这要求在数字化改革中，注重技术发展及应用的同时必须创新思维与制度供给，这是数据化改革亟须推进的核心内容。其二是信息化、智能化以及云端化的数字技术促使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成本已近为零，这时构建信息的安全网以及数据综合利用平台，保障数字信息流通的安全性与利用的时效性则是经济社会发展核心竞争力。三是数据要素以其独特的属性进入社会生产生活，其利用价值与价值体现方式对我们思考如何组织生产、有效分配、促进消费以及社会治理等提出新的要求。因此，根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带来的影响，必须对组织运作机制、市场管理机制、社会工作机制进行有效重塑。

总而言之，深入理解数字化改革的逻辑机理，在把握其大力发展数字技术，最大化器物层面价值的同时，更要科学理解这一改革背后的社会基本矛盾，变革生产关系中不符合生产力发展因素，并回归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中来，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为根本目标。（本文为省哲社规划课题“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大招标课题“数字赋能推动共同富裕的普惠机制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为宁波大学商学院讲师、浙江大学中国数字贸易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推动宁波海洋文化繁荣发展

刘建民 王军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坚持陆海统筹，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今年3月，市委市政府印发《加快发展海洋经济 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行动纲要（2021—2025年）》（以下简称《行动纲要》），宁波正借助海洋经济新引擎，向海而兴逐梦深蓝，为此，需要大力推动海洋文化繁荣发展。

把握海洋文化的宁波内涵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宁波自古即为重要的港口城市，海洋文化遗产较多，保存也较完整。唐宋以来，这里已成为我国沿海重要的商贸中心和对外贸易口岸，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中国海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海洋文化遗产。

随着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中外交往的日益频繁，宁波海洋文化的外延不断扩展，内涵不断丰富，突出表现为俊逸秀美的海洋民俗文化、源远流长的海洋宗教信仰文化、山明水秀的海洋景观文化、精美独特的海洋盐业文化、中外交融的海洋商贸文化，还有富含海洋特色的渔业文化、港口文化、科教文化、体育文化、名人文化以及文物古迹、文学艺术等。

浙东学术文化博大精深，宁波海洋文化源远流长，二者结合的文化氛围赋予了宁波人开拓进取的精神，宁波谚语“要窜头，海三湾”意思就是要发迹，出海闯世界。宁波人一代一代便是在这种海洋文化情结中长大，又将海洋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宁波的海洋文化起始于历史悠久的耕海牧渔和扬帆远航，必然兴盛于新时代海洋强国建设的进程。20世纪70年代，宁波以北仑港建设为契机，揭开了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建设的新篇章。2011年，浙江海洋经济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宁波再次被推到了时代的前沿。2018年，宁波在全国沿海14个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中，勇立潮头掘金海洋。

推动宁波海洋文化繁荣发展，需要深入把握宁波海洋文化内涵。在继承古代灿烂的海洋文化基础上，结合新时代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内在要求，把握海洋文化的丰富内涵，通过衔接古今、立足现实、开拓创新，不断发展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海洋文化。

加强宁波海洋文化的传播

海洋文化是宁波海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的先进生产力。在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宁波先民已经能够制造和利用舟楫开始海上航行，并把自己的文化传播到其他地方。自此之后，宁波沿海居民便在这块辽阔的海域上挥洒着自己的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文化奇迹。从河姆渡人最原始态的海洋捕捞，到唐宋时期声名远扬的“海上丝绸之路”，再到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全线贯通，向世界充分展示了宁波沿海居民认识、开发、利用海洋的智慧与能力。

宁波海洋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不仅取决于其思想内容，还取决于其传播能力。推动海洋文化繁荣发展，需要以价值理念传承发展为重点，遵循文化传播规律，做好海洋文化传播工作，让宁波海洋文化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为建设海洋强国营造良好文化氛围。依托各级各类媒体平台，积极创作和传播反映宁波海洋文化的文艺精品。加强对外宣传工作，大力宣传宁波的海洋文化，提升宁波海洋文化的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与时俱进地通过新媒体的形式，形成立体化的智媒时代面向全国和全球的宁波海洋文化传播新生态，全面铸造亲海、爱海、强海的社会氛围。

海洋意识作为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国家和民族关于海洋的思想、观念、行为和习俗等。宁波要在现有基础上加快普及海洋科学知识，提高全民海洋科学素养，引导青少年亲近海洋，形成关心海洋、热爱海洋的情感；加快海洋文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创新海洋文化遗产保护方式和传承途径。强化全民海洋意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坚持高站位、多层次、宽视野，推动有关部门和相关主体共同努力、形成合力，为加快建设海洋强市提供有力支撑。

推动宁波海洋文化产业发展

浙江是海洋大省，宁波是海洋大市。推动海洋文化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宁波的海洋布局，真正的发力点和看点，从来不只在产业，更在于追求更大程度的港城联动，以求更为高效地发挥资源集聚效应，进而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行动纲要》提出了“港产城文融合发展”的理念，为宁波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描绘了一幅好蓝图，也为持续推进宁波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亮明了战略。

要发挥政府对海洋文化产业的主导和培育作用，给宁波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营造更为宽松的市场环境，创新研发海洋文化产业的可操作性形态，构建富有活力的现代海洋文化产业集群，打造完整产业链条，培育成熟的海洋文化产业。做强宁波海洋文化IP，通过深入挖掘极具宁波区域特色的海商文化、海洋历史文化、民俗文化、渔业文化、民间文学艺术等文化遗产，创造性地打造海洋文化产品，并加以宣传和包装，最终形成海洋文化的强势品牌。着眼于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扩大与海洋相关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推动传统海洋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按照全面发展与重点推进相结合的原则，优化宁波海洋文化产业布局，发展宁波海洋文化产业新业态；同时加快海洋文化产业法律和制度体系建设，在海洋文化开发的同时促进海洋文化保护，保障海洋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为“宁波新兴文化产业业态升级和特色文化产业创新培育研究”项目成果）

（作者单位：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深化义务教育评价改革 助推“双减”政策落地

学有所思

陈忱

实施“双减”政策是当下教育改革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双减”政策的出台对于学生成长成才和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教学改革，让教育回归学校、回归育人本位，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具有重大意义。长期以来，教育评价的权重都以学生考试分数为核心，驱使学生为分数、名次进行赛跑、竞争；特别是中考时期普高、职高分流现象，分层分类了学生，低分生沦落为中职生。不改变“分数至上、考试至上”的片面教育行为以及现行的教育评价体系，师生、家长难以从升学压力、分层竞争中解放出来。因此，要真正实现“双减”，就必须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在深化教育评价方式改革上，应充分认识、重新梳理、与时俱进建立义务教育质量的“标准”观，彻底摒弃“唯分数”“唯升学”与“唯毕业率”“唯就业率”的教育质量评判观，统整学生评价、教师评价、学校评价各层面视角，以系统的思维进行全面顶层设计、分阶段重点突破、逐步推进，更好地推动“双减”政策落地见效。

1、促进义务教育回归本真本源

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双减”政策的文件，特别是《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睡眠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极大地强化了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体现了解决教育减负问题的决心和信心，让教育回归学校、回归育人本位，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全面提升育人质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因此，要在完善全面育人评价机制上作出回应，不能把分数、升学率当成教育质量、学生发展的唯一证明，应建立全面、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要全面认识和理解教育评价的价值，充分发挥教育评价的育人功能和办学方向：一是价值取向，要从现实功利转向关注人的终身发展；二是评价定位，要从以结果为导向的评价转向更多关注过程发展和改进；三是评价功能，从“竞争与选拔”走向师生发展、学校发展、社会发展。以学生发展为核心，以发展性评价为着力点，坚持以学生培养质量作为评价的核心内容与价值追求。

2、引导义务教育学校特色发展

基于学校特色发展和学生个性发展的视角，义务教育评价要采用多种评价，将综合评价与特色评价相结合，注重差异性和多样性，全面提升立德树人的成效。目前，在学校评价指标中过于关注对学校硬件等设施设备投入和量化指标，忽视了学校办学的产出、文化、个性和特色发展，为此，要以多维、多元评价标准来衡量不同学校的办学个性和特色：一是体现在评价种类的多样性之中；二是体现在评估标准应当具有差异性和动态生成性；三是体现在评价标准中对学校办学个性和特色的关注，引导不同类型学校根据各自实际找准定位，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特色化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3、注重教育测量与评价数字技术

2021年2月，浙江省率先进行数字化改革，各部门协同、流程再造等数字化思维方式、数字化改革成果纷纷涌现，其方法路径也为义务教育评估提供了新思路、新方向。建设教育评价信息化平台、加强教育评价实践中信息技术的运用、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评价的深度融合，已成为当今时代提高教育评价质量、推动教育评价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传统评价是以人、经验为主导，现代评价是以数据驱动、实证为主导。因此，学校评价一是要从专家的经验依托转向数据依托；二是要从以资料档案、听课、座谈等常规方式方法转向现代化评价技术、工具、量表、问卷等的使用，深入运用教育测量和评价技术；三是要基于大数据库共享平台，使学校评价依据更多元与全面、评价过程更及时与直观、评价结果更精准与科学等。

4、强化义务教育学校自我评估诊断

目前，学校评价的实施主体是教育督导部门，学校发展性评价趋向行政督导评价，缺乏真正的自评、自主发展机制。从发展性学校评价实践来看，学校普遍缺少系统梳理、缺乏体现绩效指标和创新亮点的总结提炼，不利于学校发展脉络及发展过程的呈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发展性评价的深度。因此，一要提高学校自我评估诊断意识，让学校全体教师认识到学校自我评估对学校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参与其中；二要以整体性的视角来看待学校自评，而不是与学校其他工作割裂开来；三要培养学校自我评估的专业力量，提升学校自身的评估能力和评估技术，为学校持续性的自我诊断、改进、变革提供专业支持。

5、完善义务教育学校校长评价体系

中小学校作为基础教育的实施场所，校长是引领一所学校发展的关键，校长专业能力与水准对学校发展至关重要。校长评价是推动校长不断提升自身能力与素质，促进义务教育学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而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健全的校长评价体系，现行的多是对学校管理者一年一度的考核和不定期的考查；评价更多是为了决定学校管理者的免降升留或惩戒褒奖。2013年教育部出台的《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虽有助于推动学校管理者专业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但标准本身不具有强制性和法律性。因此，要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长评价体系：一是要从制度层面制定专门的中小学校长评价法律，通过法律规范强制实施校长评价，对校长评价的目的、内容、方式、奖惩等方面进行明确规定；二是要完善现有中小学校长评价标准，保证评价科学规范；三要探索性地创新中小学校长评价模式，将校长评价体系分为管理绩效评价和专业绩效评价两大部分，全方位推进校长职业专业化发展。【本文为2021年度第五批市哲社规划课题（教育专项）“美国中小学校长评鉴体系改革走向及启示研究”（课题编号：G21-5-JY14）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宁波教育学院）】